

一盏灯,引领我探索变革之路

常生龙

在茫茫的大海上踽踽前行的船只,如果有一盏航标灯在前方隐约地点亮,人们就会看到希望;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辛勤探索的教师,如果有一盏灯帮助自己照亮前行的道路,践行起来就会更加踏实……佐藤学以及他的《静悄悄的革命》一书,就是指引我在学校教育领域探索实践的一盏灯。

从一个教室里萌生出来的变革

初次拜读《静悄悄的革命》,是在2003年。当时上海市正在推进“二期课改”,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教师理解课改的精神、践行新课改的理念,市里举办了一系列的骨干研修班。我有幸参加的是顾泠沅教授领衔的上海市“行动教育”高级研修班,在为期一年的学习期间,顾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理解“行动教育”的特质,并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读书学习资料,《静悄悄的革命》就是其中的一本。

每一次的课程教学改革,都是一次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革命。对教师来说,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已经让其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和教育信念,要改变他们的教育观念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正如佐藤学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所说,在教育方式和教育观、历史上,日本的教师正在边体验改革过程中的各种混乱状况,边摸索着新的学习方式,才使得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从一个教室里萌生出来。这本书有着非常鲜明的教育变革的现场感和画面感,那些亲历过课程教学改革过程的教师,都能够从书中读出自己。我也不例外,到现在还能回想起当年读这本书时的激动,佐藤学对学校、教师、课程的深刻阐述,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与反思。

我曾用红笔蓝笔等不同颜色的水笔将书中精彩的语句进行勾画,还旁注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并向不少的朋友、同事推荐此书。我的一位朋友将我涂写得有点儿混乱的那本书要了去,我就又买了第二、第三本……每购买一次,我都会完整地把它重读一遍,每次都有新的体会和感悟。我在做校长期间,也为教师们集体购买此书,希望大家通过阅读,能够对今天的教育改革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改变一所学校需要几年

《静悄悄的革命》是佐藤学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参观了1000多所学校,走进了7000多间教室,与教室里的学生和教师同呼吸,把自己作为教室中与大家共同生活的一员的基礎上,将教育改革实施的情况进行观察和提炼而写就的。这是一本没有大理论大叙事的小书,佐藤学用平实的语言讲述着教育的真理。这本书并不厚重,很不起眼,但你一旦开始阅读,就会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有种一口气要把它读完的冲动。很多教师在没读到此书之前,对上述说法都不以为然,而阅读之后多数都有相同的感受。

佐藤学通过指导学校改变面貌的大量事例告诉我们,改变一所学校,要从学校内部的变革开始,大体需要三年的时间。

第一年,在学校里建立起教师间互相公开授课的校内教研体制。佐藤学认为,学校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墙壁的



视觉中国 供图

阻隔和学科的阻隔。所谓墙壁的阻隔,就是一个个封闭的教室,把授课教师与其他教师隔绝开了;学科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也与当今追求合作的、互相沟通和交流的学习环境格格不入。

第二年,在学校机构和组织的简化上做文章。减少管理的层级,推进扁平化的治理策略,将教育教学的研究工作、将教师作为教育专家的研究放在学校的中心位置,其他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展开。

第三年,举办专题的展示活动。这样的展示活动不需要事先精雕细琢,关键是要让观众看到平时的日常授课情况,感受到自己在向什么进行挑战,教室里的学生是怎样学习的,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又是如何克服的,等等。要让观看者明白,他们是来看学生如何学习的,不是来看教师如何表演的。

2005年,我担任一所区级实验性示范性学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后,按照佐藤学所提供的改革路径做了一番真刀实枪的改革试验。我在全校推行相互听课机制,鼓励教师打开教室大门,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教师互相听课。我率先带头,走进每一间教室,听了学校所有教师的课。

在听课的过程中,我发现教导处制定的教师听课评价涉及三级指标几十个评价点,看上去面面俱到,但在实际听课过程中实用性不高。一方面,评价的指标太多,教师们难以兼顾听课和评价两项任务,另一方面评价的指标不具有适切性,到了具体的课堂上难以一一对应。我为此建议各教研组依据本组教师的实际、本学期改革探索的要点等,确立教研组自己的评价指标,指标要简单明了,一般不超过五个,聚焦于本学期教学改革的核心即可。

与此同时,引进现代信息技术,为全校教师安装了电子白板,增强教学内容呈现的即时性、互动性。新课程以及电子白板两项改革的引进,给教师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充分发挥此前听课评课机制的作用,并通过区级、市级的教学展示活动等,连续为教师们创设多元化的展示平台。实践证明,佐藤学的这套做法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实现了学校面貌的根本性变革,我为此写的文章《改变一所学校需要多长时间》也第一次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

在一所学校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是否可以在一个区域加以推广?2008年,我调任到教育局工作后,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我又一次学习《静悄悄的革命》,逐渐明晰了改变一个区域层面教学面貌的路径和策略。将目光聚焦在初中教育质量的提升上,并和中教科、教研室、教研室的团队们一道分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应该采取的举措,逐渐形成了学生差异的研究与分析、学生学习的特性和规律研究、校本集体备课和范式设计研究、听课指导项目、分层递进教学法的深化推进、以试卷讲评为载体的教学模式研究、作业有效性的研究、学业质量监测的研究、校长课程领导力研究、教学改进的保障举措等十大推进项目。其中核心的项目是听课指导项目,我们在区级层面组织专家组,深入到一所学校连续听两周的课,目的就是要能听到教师常态的课,发现具有教学特长的教师将其充实到专家队伍中来,找到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听完课之后,专家组会为每一个学科组的教师写一份专题的诊断报

中日书店,不一样的阅读风景

刘幸

在日本学习、生活了多少年,我就在日本逛了多少年的书店。有时候逛得久了,还是能觉察出来日本书店和中国书店许多不同的地方,但要说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个人的意见是,日本书店不太容易见到所谓的“经典”,或者说“名著”。

中国的书店里,经典从来都是主角,从文学经典说起,我们总能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反反复复以各种版式推出的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等名家作品;至于社科经典,柏拉图、卢梭、费孝通等前贤的作品也总会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还是更信赖“经典”,因为我们相信经典总会给我们更多的教益,就好像绝大多数家长领着孩子进入书店,想要找的书,首先是世界名著。家长们自己未必能判断哪本书适合孩子读,但只要封面印有“世界名著”的字样,总归错不到哪里去。

而在日本的书店里,稍显麻烦的一点在于,这样的“经典”读物往往

两个国家的阅读模式,其实各有优劣。中国的经典出得多,其实也就意味着经典出得太滥。这些年大家极力声讨一些假冒伪劣的译本,大概也是因为这些经典读物既无版权的约束,又有大量孩子要按着“指定书单”去买单,实在是一本万利的事,滥竽充数者也就多了起来。与之相反,日本的经典读物基本只由岩波、中央公论等几家很有威望的知名出版社操刀,请一流的学者译定以后,很少再有竞争者,某种意义上也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但这类经典逐渐淡出日本人的阅读视野后,我还是有一种“买椟还珠”的遗憾感,译得再好,读者不多,又有多少意义呢?这个世界上最具原创性的大经大典乏人问津,依附于其上下的书却大行其道,我总觉得很难说是一种特别健康的阅读生态。

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当下的中国还非常难得地保留着一种尊崇“经典”的心态。说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的课本里都还保

留了那么多要求“背诵全文”的篇章。背诵经典,从来都是我们语文教育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在日本,这个和我们的文明传统最接近的国度,背诵越来越失去了市场。日本人过去也有对所谓“美文”或者“范文”的讲究,但今天更多的日本人会觉得,美文美矣,欣赏一下足矣,背诵则大可不必。汉字行文的独有魅力,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对“文”的追求,可能都是导致我们至今仍注重背诵的因素,但从心理的因素来说,这种对经典的尊崇恐怕也不可忽视。

我们当然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问题,譬如,囫圇吞枣读经典的太多,没有什么好的导读类图书也是不可忽视的顽疾,被粗制滥造毁掉的经典也不少,但是,有时候,我在中国的书店里看着从天头到地脚,排得满满的一架又一架经典读物,以及在其中逡巡的小孩子,总觉得,保护这样的阅读风景实在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关系第一 知识第二

佐藤学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指出,学习的本质是学习者和教师、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同学之间的相互交往,是在交往中进行的自主的、合作的活动。“交往”有四种类型:只有一方讲话的填鸭式的“单向交往”常被批判;师生你问我答,在“热烈”的氛围中实施学习的“双向交往”常有流于形式的可能;被拒绝被阻挡的“反向交往”偶尔也会在课堂上出现;教师在授课的时候,总是容易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听学生的意见,与教师的思路不同的“异向交往”的话语,由于是教师难以了解的发言,所以特别容易被忽视。

有关学习的上述理解,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关系”在学习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从各种感官获取信息,这些信息大约有98%被屏蔽掉,以保证自己不会用脑过度,只有大约2%的信息引发了学习的动机,导致了学习的产生。如果学生和教师之间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如果学生和同学之间有着和谐的生生关系,如果班级环境让孩子走进之后充满安全感,他就会喜欢这间教室、喜欢他的老师和同学,他就会用心去捕捉教室里产生的各种信息,配合大家把学习活动有序地推进下去。反之,学生就会将自己“装在套子里”,想方设法与教室的环境隔绝。让交往更有效地发生、让学习更加生动活泼,关键是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为此,我提出了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打造绿色生态教育的区域教育发展理念,并在区级层面上做了一系列的改革试验和探索。我提醒教师要转变观念,做到“关系第一,知识第二;联系第一,记忆第二;探究第一,讲授第二”,把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作为教育变革的中心任务,持之以恒地践行下去。很多教师在持之过程中尝到了甜头,也找到了课堂教学转型的动力源。

佐藤学有不少著作都很值得一读,比如《教育方法学》《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等。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佐藤学将教师们正在亲历的教育改革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他极其深刻地指出: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是从一个个教室里萌生出来的,是根植于下层的民主主义的,以学校和社区为基地而进行的革命,是支持每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是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革命”。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理念设计必须与自下而上的课堂教育实践相结合,才能稳步推进教育改革向着既定的目标迈进。课堂是改革的主战场,教师是改革的主力军,当教师能深刻理解改革的理念,并成为改革的推动者时,就是改革的宏大愿景落地之时。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中华文化源于中华文明的发育和成长,历史悠久,丰富而灿烂,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中华传统文化相比于其他文明、其他民族产生的文化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其中最基础的就是汉语、汉字以及由此产生的汉字文化。

汉字的生命力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因而各种文字系统都必须具有表达形、音、义这三方面内容的功能。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汉字的造字基础是象形,以绘画来表达意义,如“天”“日”“人”这些字,当然当时也一定有读音,怎么读,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了。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造字的需求越来越多,于是出现各种不同的造字方法,古代有所谓“六书”之分,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形声的造字法,创造的形声字占了汉字的绝大部分。

按照清华大学黄德宽教授的观点,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危机。第一次是汉字创造初期的造字危机,因为象形字要画画,很不容易造新字,造了其他人也很难辨认。只靠象形造字,新字很难产生,语言就没法进一步发展。很多古老民族的象形文字,就是因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消亡了。中国的先民用形声字解决了这个问题,发明了音符、义符,组合出了无限的汉字。音符和义符也成为后代所谓的部首,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再到小篆的阶段,创造出数千个汉字,满足了记录的需求。第二次危机是书写危机,汉字流行以后,要求书写快速、字形简单,小篆字形很复杂,也很难写快,于是就出现了字形在书写时的简化,隶书应运而生。汉字经过隶书,再到楷书的发展,终于长期稳定下来。第三次危机发生在晚清民国时期,属于文化危机。由于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殖民化进程,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失败,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汉字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主张废除汉字,全面拉丁化,以简便易学。拉丁化文字是拉丁文字,而中国方言众多,该记哪个音呢?于是推动了“国语运动”,为此还发明了注音符号来记录语音,并且提倡文字简化。解放以后,我国确定以北京话为基础,推行普通话,发明了汉语拼音来标示汉字读音,同时通过简化文字来普及汉字,实现了全民扫盲。由于全民的汉字普及,废汉字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由此解决了第三次危机,汉字文化至今仍在蓬勃发展。

汉字为什么伟大

汉字是人类早期发明的延续时间最长且从未中断的文字。它有5000年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汉字承载了人类历史最丰富的文献典籍,具有最强大的记录历史、记录语言、记录思想的能力,并广泛传播。

汉字既可以记音,而又摆脱方言的束缚而存在,可以为使用不同语言的族群所共同使用,造就了多族群、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认同,极大地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汉字依托部首而可以不断地创造新字、新义的能力,依托汉字而不断组合出新词的能力,依托大量的成语(固定搭配、固定意义、固定用法)来维系汉语表达的规范性和传承性的能力,让汉语在任何时代都能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激发出勃勃生机和生生不息。

汉字易学易用,只要学会汉语,汉字就不难学了,认得600个汉字就可以扫盲,认得3000个汉字就可以正常地进行文字生活。

汉字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历史、文学、艺术,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异常丰富多彩、高贵典雅。同时它也适应了数字网络生活,并向全世界进行广泛传播,为各民族人民所使用。

所以,汉字是中华先民奉献给民族最伟大的礼物,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永远珍视。中华文化所有的精髓主要是通过汉字流传下来的。所以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学习汉字是必由之路。不精通汉字,谈不上掌握中华文化。

阅读辞书的必要性

汉字记录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所见所闻,成为文章、图书,我们称为文献典籍,也可以统称为文字资料。其实这类文字资料还可以分作两个类型,一类叫信息,一类叫知识。信息是可以随时空变迁而消失的,它不具备积累传承的意义,而知识则需要积累传承、学习并反复使用。中华文化之所以独特,中华民族之所以聪颖,就是因为有几千年的知识积累下来,为后代所继承,成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学习汉语就是继承这笔精神财富的必要途径。

人类所有的知识积累,都是附着在文字上,并通过文字来呈现传播的。汉字的每个字,每个词都是通过知识

中华传统文化与辞书阅读

顾青

的汇聚。中国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中国最早的词典叫《尔雅》,收了4300多个词语,那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存在的一本书。到了东汉,有一个人叫许慎,编写了一本字典,是中国最早的字典,叫《说文解字》,收录了540个部首,9300多个汉字,用小篆出字头,有读音、释义、字形分析,是汉代以前几千年汉字文化的集大成的总结。《尔雅》在唐代成了经书,而《说文解字》在文字学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人都是要精读细研的。

这里必须要辨析一个概念,叫“工具书”。现在都称字典、词典、百科全书、手册等为工具书,好像它们就是作为工具被使用,备查备用的。这种叫法容易让人只重视其工具性,而忽略了它的文化性。其实,辞书不是工具,而是伴随人一生的东西。辞书有几种类型:第一种是语文类的,解决语言文字问题的,比如《新华字典》。第二种是专业类的,里面涉及专业知识、体现专业功能,比如《中国医学大辞典》。第三种是百科类的,包含各种知识。

“典”是人人都要学、都应遵从的经典。什么样的书才能称为“典”呢?只有高水平的、权威的辞书方可称为“典”。优秀的字典、词典是专业学者对专业知识进行系统整理之后,提炼出最基础、最准确、最精粹的知识的汇编。每个词条都要先广泛搜集资料,认真分析,深入研究,最后归纳、提炼出几十个词,把它讲清楚、说明白。所以编纂辞书是一件很苦的事情。陈原先生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的丁声树先生就是圣人。《现代汉语词典》成为一部经典,是一批像丁声树先生这样的圣人之功。

优秀的辞书是多年累积的,需要长期修订、不断维护,在社会生活中积淀,在群众使用中实验。比如在19世纪50年代“癌症”的“癌”读 yān,这样“癌症”和“炎症”同音,分不清,带来很多麻烦。丁声树先生在主持《新华字典》修订工作时把这两个字的读音做了区分,一锤定音,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新华字典》到现在第12版,是70多年打磨出来的。

辞书是需要细读的,尤其经典辞书是需要熟读、细读、精读的。《新华字典》是当代读书人阅读辞书的最好文本。《新华字典》是语言学家们数十年打磨出来的中国文化最精粹、最基础、最硬核的知识总结。如果一个孩子在年轻时就读熟,相当于继承了5000年中国文化的经验,可以满足今后一生所碰到的绝大多数的知识需要,因而也就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如同古代的读书人要熟读《尔雅》《说文解字》一样,当代中国的年轻人就应该熟读《新华字典》。习近平总书记任陕西当知青的时候,熟读《新华字典》,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中小學生尤其應該讀經典的辭書,比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古代汉语词典》。这样的积累是为学学生一生的成长打下基础的。学生的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还能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和强大的学习能力。每天10分钟、20分钟的积累,学生的中文底子就打好了。有了这个基础,年轻人心中就深植了中国文化基因,为其一生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